

古城旧事



钟楼街情结

赵斗钢

既有浓郁的中国古典风格,又有欧美建筑特色的太原钟楼街完成提质改造,在数百万太原市民的期待和瞩目下,建好开街了。

9月19日,开街当天的下午,我专门带相机去了钟楼街,想记录下太原钟楼街开街第一天的景象。和预想中一样,钟楼街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络绎不绝。还有成年人肩上扛着孩子,轮椅里坐着行动不便的耄耋老人,人们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扶老携幼,他们奔走相告,他们带着期望而来,他们带着想象而来,他们要第一时间看看久违了的钟楼街变成了怎样的模样。

一条商业街道重新重建,是会引起一些关注,但是像太原钟楼街这样引得全城火爆,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水泄不通,可不是容易看到的景象。老太原人会记得,四五十年前的太原钟楼街,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人声鼎沸的景象。

我还清晰地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钟楼街是全太原市唯一的一条集中化的商业街。这条街道大约长七八百米,宽十几米,街道两边集中了太原大部分的老字号商店、饭店,从西往东有大中市、乾和祥、开化市、合作大楼、老鼠窟、华泰厚、上海饭店、亨得利、开明照相馆、老香村等,在这些店铺之间还夹杂着一些其它的店铺。那时的生活很

难忘时刻

起红薯

梁建军

秋天里,高粱玉米都成熟的时候,红薯也就成熟了。那天,村里安排我们知青挖红薯,村里叫“起红薯”,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起红薯,以前吃过红薯,但没见过在地里的样子,觉得有些新奇。

红薯地离我们宿舍不远,种在一块沙土地里,这样的红薯长出来甘甜好吃。下午,正准备出工,队长过来了,边走边叫:“动弹了,动弹了……”村里把下地劳动叫“动弹了”。队长一喊,我们就陆陆续续拿上镰刀、箩筐,跟着队长向红薯地出发。

红薯是根茎作物。果实,也就是红薯长在地下,红薯蔓绿绿地趴在土地上,薯叶像绿色的波浪,把黄土地遮得严严实实,红薯都藏在黄沙土里。我们用镰刀把红薯蔓割去,抱到一边。割红薯蔓时要稍留一些根茎在外面,让起红薯的人容易找到红薯窝,方便起红薯。红薯蔓社员们就拉回去喂猪,喂牲口。

起红薯是个体力加技术的活,都由村里的男劳力完成。起红薯时要在红薯垄旁,离红薯根一尺来远的地方用镢头往下刨,一镢头深深地刨下,往起一翘,一窝红红胖胖的红薯就跳出来了,有的红薯没挖净,再用镢头把旁边的红薯刨出来。红薯是不能伤皮的,碰了皮保存期就会缩短。起红薯的技术就在于下镢头的距离和深度,镢头下得远了深了费工,近了浅了会把红薯刨断。

乡土记忆

拾秋记

寇俊杰

夏天拾麦子,也就是三五天的时间,但秋天就不同了,它可以拾一个秋天,而且大人们忙着收秋——拾秋就是我们小孩子的事儿了。

那时学校在国庆节后放半个月秋假,因为玉米先掰,所以我们就从拾玉米开始。掰过玉米的地里,秸秆还没有被砍倒,一棵棵密林一样挺立着。我们就像钻进青纱帐的游击队员,顺着地垄往前走,眼睛像机关枪一样左右扫射着,看有没有被遗漏在秸秆上的玉米棒子。看到有还长在秸秆上的玉米棒,我们就像是看到珍珠一样,急速穿行过去,“咔嚓”一声,把玉米掰下来放在竹篮里,竹篮顿时沉甸甸起来,我们的幸福感、成就感瞬间随之高涨,满心欢喜地继续搜寻……拾玉米很辛苦,不但玉米地里闷热,而且粗糙的玉米叶子会把胳膊、脸上划得一道一道的,汗水一蜇,又疼又痒,但看着拾到的玉米,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尽管有时拾到的玉米少,却让我们体会到了父母劳动的艰辛。

岁月留痕

西山往昔

文/陈士琴 图/刘冠麟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安家到了位于城市西端的白家庄矿。

那时矿区的生活条件差,周边的环境治理一直没有跟上去。大大小小的运煤车从早到晚,都行驶在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上,不仅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煤尘四处飞扬。住在临街的居民,根本不敢打开窗户,就是走上一段路,身上都会沾满了尘土。矿区的后山里,还有不少私自开采的小煤窑。从这些煤窑出来的大卡车,更是在路上横冲直撞。路边的小河道里流的是井下排出来的黑水,加上人们乱倒的垃圾和污水,更是影响着整个矿区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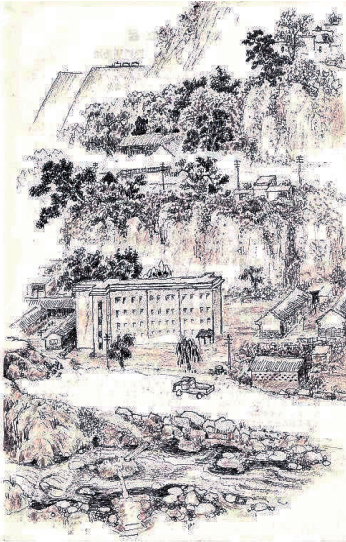
当时,老矿只有一条线路的公交车,遇到下雪路滑,就不往前开了。上班上学的人们,只好早早出门,沿着矿区的一条铁道线往下走。1971年正月,我在临产的那天,恰逢是下雪天。清晨出门没有公交车,艰难地走到一个地方,看见乘车的人拥挤不堪,我们也上不去。那天早上爱人正好参加高产去了,老妈妈和十几岁的外甥女陪着我,一直等到快9点才坐上车去了局里的医院。后来我常常开玩笑说,幸好我的孩子结实,没有提前跑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一个清明节,学校组织学生去黄坡烈士陵园扫墓,我们是翻山越岭去的。那时的西山还没有开始整治,山上到处都是垃圾堆,也没有大路。师生们手拉着手,穿荆棘走小路,下坡上坎。还有几次,我们去山沟里接泉水,路过的垃圾已经堆成了山,腐烂变质的垃圾简直不能让路人忍受。当时我还问爱人,为什么城里的垃圾都要往西山上倒呢……

退休后,我几次陪着矿上的老劳模傅昌旺师傅到他在山顶上义务开辟的一大片林地,也是在煤矸石和垃圾堆里。老师傅傅挖坑植树,都是用双手搬开那些煤矸石和垃圾,辛苦极了。

一年年过去,看着一辆辆挖掘机开进了山里,一群群开山劈路的人走进大山,一条条大路渐渐地延伸进矿区,一片片绿地铺满了西山,一棵棵小树苗长成了林地。山绿了,河道整治了,成年堆积的垃圾彻底处理了。污染清除了,矿区的空气清新了,堆积煤矸石的大山也种上了青草鲜花,西山生态园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了。通往矿区的道路经过几次翻修重建,前不久正式通车。如今,路更宽了,公交车也有好几条线路了……

走进西山,一次一个大变化,一次一个新气象。我由衷地感叹不已,矿区百姓的生活环境大变样了!



童年记录

我家的病号饭

方仲平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常常患病,肚子莫名其妙地出现绞痛,时长大约半个小时。我妈领着我去铁路医院看病。经大夫诊断,肚疼属先天性疾病,十三四岁会自动消失,不必介意。如果肚子疼得厉害就吃一片止痛片。

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阵子病得厉害,最初的几次,感觉老师比我还紧张。我病的时候,老师把我领到办公室,几把椅子拼在一起,让我躺在上面休息。待好一点时就让同学们送我回家。

为不影响工作,父母商定把在老家的奶奶接来,帮着照顾我们几个。奶奶很快安顿好老家的事就匆匆赶来了。在我又一次发病时,奶奶看着心疼,又束手无策。该做饭的时候,奶奶问我想吃什么,见我无语,奶奶便说给你做碗病号饭吧。

工夫不大,一碗香飘四溢、热气腾腾的鸡蛋挂面汤端上了餐桌。一个比平时吃饭用稍大一些的碗里放了一小把龙须挂面,打了个荷包鸡蛋,汤碗里撒了些许小葱、香菜,还滴了几滴香油,添加了调味料。弟弟和妹妹也跑到厨房嚷着要吃奶奶做的病号饭。从那时起,我们家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家庭成员病了,可吃病号饭——鸡蛋挂面汤。

奶奶在我们家住了好长时间,她回老家后,我家吃病号饭的习惯没有变。我们家姊妹六人,生病时都吃过老妈做的病号饭,享受过涓涓流水似的母爱。